

鲁迅文化经典的当代阐释

——在鲁迅研究二十年国际学术讨论会上的发言

陈漱渝

(北京鲁迅博物馆, 北京 100034)

摘要: 鲁迅文化经典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对鲁迅文化经典的解读与阐释,既是文化上的寻根认祖,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缺失的针砭和疗治。鲁迅研究应该在积极意义上参与当今时代,自觉地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能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

关键词: 鲁迅;文化经典;现代性

中图分类号: I210 **文献标识码:** A **文章编号:** 1009-8860(2005)01-0112-06

—

记得鲁迅博物馆的新任副馆长孙郁写过一本书:《鲁迅——二十世纪最忧患的灵魂》。鲁迅究竟忧患到什么程度呢?这次开会之前,偶尔翻阅许广平的一篇文章,才知道鲁迅忧患到了在中国九百六十万平方公里的土地上竟没有可以容身之地。这篇文章的题目叫《如果鲁迅还在》刊登在1941年10月18日《上海周报》第4卷第17期。当时正值鲁迅去世五周年,许广平想的是:假如鲁迅还活着,他能住在什么地方?

居留上海?鲁迅临死前,已决定搬出位于半租界的大陆新村寓所。当时他主要攻击本国的黑暗,还可以苟安于日本的势力范围。如果日本占领了上海,鲁迅用笔跟占领军发生正面冲突,那住在原址是万万不可的。西迁重庆?也不可能。鲁

迅个性爱静,不喜搬迁,以鲁迅的敏感,到重庆去揭露国民党当局阻碍团结、制造磨擦、营私舞弊,肯定也栖留不住。去陕北延安?也不见得。鲁迅的病体承受不了边区的艰苦,团体生活与不断的集会也为鲁迅所恐惧。边区政府对他的礼遇与优待,他本人也绝对不肯接受。“尤其重要的是:他的一切的表现于文字的,纯乎凭着自己负责,并不是受有什么团体性的机构所约束的,所以去了反而容易使一些不了解的人作借口。”重回北京?1929年和1932年鲁迅两次回北京探亲,曾受到学阀们的排斥,甚至险些被公安局拘留。那里不欢迎鲁迅“卷土重来”,鲁迅也“绝不会自己跑去受无聊的鸟气”。只剩下一条路:到香港做寓公。但香港百物昂贵,怎能容鲁迅这样一个寒士安居?所以许广平想来想去,终于想不出一个可以让鲁迅安身的地方。

然而,鲁迅又恰恰是这块让他无处容身的土

收稿日期:2004-09-10

作者简介:陈漱渝(1941—),男,重庆人,全国政协委员,中国鲁迅研究会副会长,鲁迅博物馆研究员,主要研究方向为中国现代文学。

地孕育的。这也许构成了一个悖论。因为没有这块灾难深重的土地,就没有鲁迅的呐喊和怒吼,就没有鲁迅的忧患和愤激,从而也就没有鲁迅式的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那洞察三界的眼光,一语破的的论断,寸铁杀人的文字。但我们并不是鲁迅,只不过是鲁迅的崇敬者、研究者、阐释者,又欣逢太平盛世,因此我们应该没有鲁迅那么多的忧患,也不必像鲁迅那样活得沉重。不过,研究和阐释鲁迅毕竟不会像唱流行歌曲那样轻松。鲁迅研究其实是一种非常前沿的学科,在新时期社会科学发展的进程中常常居于先锋的位置,很多新观念、新方法都是鲁迅研究领域率先引进、率先运用的,所以我们难免要比研究其它学科的人付出更多的代价,承担更大的责任。这也许就是鲁迅研究者的宿命,或曰鲁迅研究者必须直面的人生。

鲁迅研究应该在积极意义上参与当今的时代,跟当下社会生活相互激盈,更自觉更积极地回应新时期现代化的思想文化主题。一个民族的文化传统其实就是这个民族的精神链条。因此,对文化传统的研究,尤其是对文化经典的研究,一定要把握其历时性与即时性的交汇点,使其恒久的文化意蕴能与现实的社会需求有机结合起来。只有这样,像鲁迅著作这样的经典文化才能够在历史与现实、阅读与阐释、接受与深化的互动中得到价值增值,从而使读者感到常读常新,历久弥新。更何况鲁迅经典本身的确包含着丰富的现代性因素,为我们进行当代性解读提供了无限生动的广袤空间。

比如环境问题,目前已经上升为全球性的重要问题。我们在付出了惨痛的代价之后才认识到,必须立即扭转长期以来人类单纯向大自然索取的历史,逐渐恢复较为健康稳定的生态系统,人类才有可能比较长远地在地球上存活。2003年10月,有两位科学家(彼得·施瓦兹和达哥·兰德)向美国中央情报局递交了一份秘密报告,后被泄露,报告的题目就是《气候突变的情景及其对美国国家安全的意义》。这份报告认为,21世纪全球将显著变暖。这种变化将导致湿度下降,干旱持续,食物短缺,能源中断,国与国之间可能获取食物、洁净水源或能源而发生战争。我们不必认同作者的立场和每一个预测,但却不能忽视其前瞻性和预警性。

令人惊叹的是,至少在74年前,鲁迅跟他的

三弟周建人就共同关注着这个关系到人类未来命运的生态问题。1930年7月,周建人翻译了八篇关于生物科学的文章,交上海光华书局出版。其中末两篇鲁迅认为最要紧:一篇是匈牙利科学家英吉兰兑尔(A. L. Englaender)撰写的《沙漠的起源、长大及其侵入华北》,另一篇是美国科学家亚道尔夫(W. H. Adolph)撰写的《中国营养和代谢作用的情形》。前一篇告诉我们中国的沙漠已经南徙,后一篇告诉我们中国人的营养已难以支持,向现代中国人敲响了警钟。鲁迅特意为此书撰写了一篇引言,文中还特别引用了美国记者史沫特莱(A. Smedley)的一篇报道,内容是北京遭灾,京郊南苑有六十多个男女村民被迫砍树卖钱,剥树皮充饥,结果被警察监禁(《二心集·〈进化与退化〉小引》)。鲁迅认为靠镇压百姓的方法并不能达到保持生态的目的,反而会增加剥树皮、掘草根的人民。如果中国的生态被破坏,林木伐尽,水泽干枯,将来的一滴水,将和血液等价。他还进一步指出,环保问题不仅是自然科学范畴的问题,而且是社会科学的问题,因为在一个没有“以人为本”的政治体制下,环境问题不可能得到真正解决。所以鲁迅说:“接着这自然科学所论的事实之后,更进一步地来加以解决的,则有社会科学在。”

可以跟这篇文章相呼应的,是鲁迅在上海时期跟日本邻居原胜的另一席谈话,内容为“论中国沙漠化”。鲁迅十分动情地说:“请看看中国广阔无垠的原野、山岭吧,哪里还有像样的树木!山岭是光秃秃的;田野上幸存的也都是些幼小的树木。然而,就是为数不多、自然生长着的小树,现在也没有了吧。什么缘故呢?中国的老百姓生活得贫困不堪,面临着饿死的危险。他们为了生活下去,竞相剥去树皮食用,挖出树根充饥。民众处于这种状况,中国是长不出树来的,于是政府的植树造林政策也就归于失败了。……这件事对中国来说,是一场多么大的悲剧呵!……命运注定了中国的悲剧,如同沙漠化的中国的未来一样,正在发展着。”^{[1](P169)}

鲁迅所说的沙漠化,是中国的一种传统说法。英文“Desertification”一词的本义是指荒漠化,即沙质荒漠化。现代科学证明,荒漠化即土地退化,它跟海洋污染和物种灭绝共同构成了影响人类生存的三个重大问题。目前,中国成为了受荒漠化危

害最严重的国家之一。荒漠化地区涉及了全国 18 个省区, 471 个县, 那里生活着 31 个民族的近 2 亿人口。鲁迅在七十多年前就尖锐提出了上述问题, 反映出鲁迅的超前意识和对民族命运的深刻焦虑。

又比如, 21 世纪的一个强大新潮是自然科学、技术科学跟人文科学、社会科学的共生共建和谐发展。许多学科之间的界限将愈益模糊。文中有理、理中有文将成为未来学科的特点。科技展现了人类调节自然关系的智慧, 并为人文的发展提供了物质保证; 人文展现了人类调节自身关系的智慧, 并为科技发展提供了价值规范。两者共同追求的都是一种和谐的境界。在推动欧洲从“中世纪”转入“近代”的文艺复兴时期, 正是因为继但丁、彼特拉克、薄伽丘之后, 又出现了哥白尼、布鲁诺、伽利略, 通过这种人文与科技联手的巨大力量, 才最终冲破了神学的桎梏, 迎来了人类文化史上的曙光。今后要回答宇宙的起源、生命的起源、智力的起源等尖端问题, 同样也要进行跨学科研究。正是在这些学科交叉领域, 将出现未来重大的创新成果。然而到了 19 世纪, 却出现了“重物质而轻精神”的偏颇, 芸芸众生都为物欲蒙蔽, 人们精神的光辉愈趋暗淡。正是在这个必须拨乱反正的历史关头, 26 岁的鲁迅发表了文言论文《科学史教篇》呼吁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融合。他满怀激情地写道: 人们所需求的不仅是科学家牛顿, 也呼唤莎士比亚这样的诗人和剧作家; 不仅要有拉斐尔这样的艺术巨匠, 也要有物理学家、化学家波义耳这样的科学大师。只有这样, 人性才能得到全面发展, 世界文明才能真正实现。

为了促使人文科学和自然科学的交融, 鲁迅致力于科学普及工作。1903 年 10 月, 他翻译出版了法国儒勒·凡尔纳的科幻小说《月界旅行》紧接着, 又翻译了同一作家的另一部科幻小说《地底旅行》其目的就是借助于文艺的生动性和感染力来传播科学知识, “破遗传之迷信, 改良思想, 补助文明”(《月界旅行·辩言》), 从而改变科学高深莫测、令人生畏、令人生倦的形象。据考证, 第一部被译成中文的西方科幻小说是儒勒·凡尔纳的《八十日环游记》由逸儒译, 秀玉笔记, 1900 年世文社出版发行, 而中国人自己创作的科幻小说(如徐念慈的《新法螺先生谭》和荒江钓叟的《月球殖民小说》)都发表于 1904 年。可见鲁

迅不但科学观十分前卫, 而且在中国的科普界也置身于前沿位置。

令人遗憾的是, 时至今日, 中国的自然科学与社会科学不仅壁垒森严, 而且科普作家后继乏人。据统计, 在拥有 13 亿人口的中国, 经常从事科普创作的作家仅有 78 人, 其中 60 岁以下的又只有 9 人。^[2]前不久, 中科院院士裴钢跟上海女作家王安忆就科学与人文的交融进行了两个多小时的生动对话。这种做法有利于帮助人文知识分子更好地理解科学的人文意义, 同时也有利于科学家重新唤起他们心中本来就有的人文自觉。这实际上是对一个世纪前鲁迅崇高理想的赓续和传承。

鲁迅文化经典中包含诸多现代性因素, 这就决定了它具有意义的生长点, 为我们对其进行当代阐释提供了前提条件。尽管中国的诠释学跟西方的诠释学有着不同的方法和侧重点, 如中国的诠释重原意, 强调文本意义的客观性, 而西方的诠释强调意义的流动性和生成性, 反对绝对化和确定性。但这两种诠释学也有相通之处, 应该取长补短, 相互沟通。忽视经典文本在现代所生发的意义将使经典失去活力, 成为僵死的化石。但如果读者对经典的感悟和褒贬跟经典作家的原意和经典作品的原意相割裂, 那就变成了阐释者的自说自话, 甚至导致对经典文本的曲解和利用。

当前不同研究者存在的共同困难是: 我们置身的是一个多元化的时代——文化多元化、所有制多元化、意识形态多元化。这就决定了在对文化经典进行当代阐释时必将发生观点的碰撞。在后现代主义思潮的冲击下, 有的学者反对中心化, 主张边缘化; 反对结构化, 主张解结构; 反对绝对理性, 主张非理性或重建理性; 反对宏大话语, 主张文化世俗化。这种思潮在鲁迅研究领域必然有所反映。在疏离中心、消解权威、颠覆既定价值的过程中, 不断有人对鲁迅作品提供历史新解, 对鲁迅作品中那些历来认为具有恒久意义的内容进行质疑和消解: 其中有些意义的消解是合理的(如在神化鲁迅时期的一些不切合实际的提法), 反映了历史的进步; 而有些意义的消解和价值标准的错位则未必合理, 所反映的是历史进程的曲折。

我认为,研究历史人物(包括鲁迅这样的经典作家)有两个角度:一、该历史人物作为客观存在的原生态,即本真状态;二、该历史人物与当下的关系。第一个研究角度是认识论的角度,第二个研究角度是价值论的角度。认识论的角度偏重于客体,价值论的角度偏重于主体。前者关注保真度——历史人物的历史本体是这个样子吗?对这个人有没有神化、圣化或者歪曲贬损?后者关注相关性——研究这个历史人物有什么现实意义?跟时代需求有什么契合点?能为当代人提供什么思想文化滋养?实质上,这两种研究角度并不是相互排斥、相互对立的。一部生动的鲁迅研究史证明,既然要从历史深层开掘鲁迅的精神资源,就需要系统、真切地了解鲁迅的生平史实,及其多方面的文化实践活动。突出价值论的视角决不意味着可以漠视史实;相反,它在史料积累和考辨上对研究者提出了更高的要求——既要今天的读者负责,也要对作为历史人物的鲁迅负责。否则立论就如沙上建塔,顷刻即倒。另一方面,没有正确的价值观,对鲁迅史实的取舍和考辨就会产生盲目性,甚至可能舍本逐末,误入迷途。

最近有一位叫朱洪的作者,在《百年潮》今年第8期发表了一篇文章,题为《陈延年与鲁迅在广州的两次见面》。陈延年是大革命时期中共广东区委书记。如果能提供实证,证明鲁迅跟他确有两次会见,那不仅对鲁迅研究,而且对研究党史都极具价值。遗憾的是,作者的论据仅仅是1927年3月25日和31日的鲁迅日记中两次出现过一个人名:陈安仁。这位学者用破字谜的方法考证说:陈延年是安徽安庆人,跟“陈安仁”的“安”字相吻合;陈独秀跟鲁迅同辈,陈延年是鲁迅的老仁侄,跟“陈安仁”的“仁”字相吻合,所以陈安仁等于陈延年。其实陈安仁跟陈延年两不搭界。他是广东东莞人,当年任国民革命军总政治部编审委员,1889年出生,1964年去世。其生平简历见诸《广东近现代人物词典》。这使人联想起若干年前香港有一位教授,用同样的方法破解“鲁迅”这个笔名,说“鲁迅”的“鲁”是鲁迅之母鲁瑞的姓,反映了鲁迅的孝道;“迅”跟周作人的日本老婆羽

太信子中的“信”谐音,影射了鲁迅的暗恋对象。所以“鲁迅”这两个字组合起来,表现了鲁迅内心孝道与恋爱的矛盾。在考证历史人物的过程中,破译姓名密码的方法并不是绝对不能用,但需要进一步提供实证。如果没有其它确凿的史料作为佐证,把拆字谜的推测当成真实的历史,那决不是一个严谨学者应该采取的做法。

在鲁迅史料考辨过程中,把无当有的情况一直存在。记得20年前,上海沈鹏年伪造史料,说毛泽东到北京八道湾拜访过鲁迅;又说周作人出任伪职是中共地下党的策动。我跟其他一些学者、当事人对他的谎言进行过揭露和谴责。中共上海市电影局委员会也为此成立了专案组进行调查,通过大量人证、物证证实沈鹏年提供的所谓“毛泽东谈话纪要”、“周恩来谈话纪要”纯属伪造,所谓王定南、袁殊等人的谈话记录在关键问题上也是编造的,并对沈鹏年进行了必要的组织处理。这份调查报告隐去旁证人的姓名后,曾以“尚颖菊”为笔名公开发表,以正视听。使人料想不到的是,今年7月16日,又有人把沈鹏年伪造的材料重新炒作,刊登于在学术界颇有影响的《文汇报》。可见有些人和媒体一直热衷于把谣言当成卖点,对于炒作此类耸人听闻的虚假新闻乐此不疲。

相反,实有的事情也常被人说成无。比如鲁迅逝世前不久,冯雪峰征得鲁迅同意,用鲁迅的稿费买了一只相当大的火腿送给陕北的毛泽东。差不多同时,鲁迅还拿出两本《海上述林》(上卷)的蓝绒皮脊精装本,托冯雪峰转送毛泽东和周恩来。这两种礼物冯雪峰都委托中共驻西安办事处转交,后来书送到了;火腿可能因为不易保存,被在西安办事处工作的刘鼎等人吃了。这件事冯雪峰本人披露过,也曾得到毛泽东、张闻天的证实。但有一位叫陈福季的作者打着我的旗号否定此事,发表在今年9月10日的《文汇报》,理由是火腿为当年在北平任教的许德珩及其夫人劳君展所送。许是进步教授,劳是毛的老乡,他们托人送火腿给毛泽东完全是可能的。但以此为据否认鲁迅也送过火腿则不合逻辑。把两件完全可以并存的事当成两件非此即彼、相互排拒的事,这种考证也是违反学理的。这些年来,鲁迅研究领域还就所谓“鲁迅生平之谜”进行了唇枪舌战,笔墨交锋,甚至闹意见,伤和气。但在我看来,所辩论的很多问题其实

都无关宏旨,不可能真正提高鲁迅研究的学科品位。所以我刚才说,有些表面上属于技术操作性的考证,其实还是应该以正确的史实观作为指导。因为不同的史实观会彰显或掩盖不同的真实,这也是为一部丰富多彩的鲁迅研究史所充分证明的。

跟混淆史实相关连的还有一个“戏说”问题。所谓“戏说”是在多元文化因素交织形势下出现的一种引人注目的现象。“戏说”跟通常意义上的“改编”有所不同。“改编”是基于转换艺术形式需要而进行的一种再创作,其中虽然不可避免地蕴含着改编者个人对原作的接受因素,但仍然保持着跟原著中人物和事件的内在联系,两者在精神实质上是相通的。优秀的改编本甚至是对原著的提升。“戏说”则是改编者借原著躯壳进行的一种随意性的发挥,为迎合市场需求而不惜降低原著的艺术性,甚至颠倒原著的基本价值观念。比如,在新编电视连续剧《林海雪原》中,匪首座山雕被刻划成了一个憨厚的老农,他的养子竟然是剿匪英雄杨子荣的私生子。在新编小说《沙家浜》中,足智多谋的革命者阿庆嫂摇身一变成为了一个丧失理智的风流荡妇。遭到“戏说”的并不限于“红色经典”。由于原创型的优秀剧本匮乏,许多编剧和制片人纷纷把目光投向广为读者所知的名著。像张爱玲的《半生缘》《金锁记》就多次搬上银屏,遗憾的是注水太多,原著独特的神韵与内涵流失,不少观众认为“张爱玲”变成了“琼瑶”。

这种“戏说”的浊流也冲击到鲁迅作品改编领域。在鲁迅诞生 110 周年之际,江苏某摄制单位推出了一部十集电视连续剧《阿 Q 的故事》。该剧编导像一个神奇的魔术师,大笔一挥,就把五四时期受旧传统束缚的新女性子君变成了清末一位县太爷的女儿,又让被假洋鬼子殴打的阿 Q 一变而成为他的情敌。为了媚俗,剧中还设计了一场三角恋:阿 Q 跟革命者夏瑜共同争夺“连半个秀才都没有捞到”的孔乙己的女儿。这样一改,鲁迅原著中深邃的改造国民性主题荡然无存,鲁迅原著中那些深刻的心理刻划、幽默而极具个性化的语言都被淡化了,于是“戏说”变成了对经典的亵渎。我这样说,并非鲁迅著作不能改编,只是想突出强调两点:一、鲁迅的小说作为文学经典,它具有思想的穿透力,形式的不可重复性,艺术的难以逾越性,因此改编者也必须具备与之相应的

精神气质、人格力量和文化功力。二、鲁迅小说中有些作品具有情节的生动性和丰富性,为改编者提供了发展延伸的必要空间,如《药》《祝福》《伤逝》《铸剑》。有些则不适合于通过作为音画艺术的电影、电视来表现,如《狂人日记》。改编者在选材时必须充分考虑改编对象内涵的视听元素。否则就会事倍功半,甚至是动机与效果适得其反。

鲁迅研究及其作品改编中还要防止“过度阐释”。“过度阐释”这一概念我最初是从美国批评家苏珊·桑塔格(Susan Sontag)的一篇文章中接触到的。记得她说过这样一句话:过度阐释导致了意义的通货膨胀。神话正是由意义的通货膨胀支撑着的,如同经济泡沫阶段是由大量印刷的纸币支撑着的。能不能这样理解:所谓“过度阐释”,就是超越了作者原意和文本原意的一种不恰当的引申发挥,明修历史“栈道”,暗渡现实“陈仓”。根据接受美学原理,文艺作品的意义在一定程度上是由它的接受者赋予的。或者说,在特定意义上,文艺作品是由创作者与鉴赏者彼此心灵的共同创造。法国作家法郎士说:“我敢断言,《伊利亚特》和《神曲》的任何一句话在我们的理解当中都没有保留着最初所赋予它的那种意义。”这就是说,读者群体的非同一性,可以使文艺作品在流传过程中产生无限多的意义。但作为一个严肃的研究者,在阐释经典作品时还是应该努力寻求作家作品的客观真实跟当代性真实之间的契合点,而不能完全背离创作主体的精神真实。

大约在 1933 年底,冯雪峰跟毛泽东在江西瑞金中央苏区有一段对话。当时冯告诉毛,鲁迅读过他的诗词,比如 1928 年创作的《西江月·井冈山》认为毛的诗词有“山大王”的气概。鲁迅所说的“山大王”气概原是取其褒意,因为浙东多山,民性有山岳气,与湖南山岳地带的民气相同,所以鲁迅用“山大王”气概来形容一种骠悍刚直、好勇善战的豪气。但有一位知名学者却在他的鲁迅传记中这样阐释:鲁迅从毛泽东的诗词中看到是赤裸裸的功利心,无遮饰的绿林气。他向来不敢轻信“山大王”一类人物,深知他们造反成功就会迅速地翻脸变脸,变得比前任更加专横,像自己这样的人恐怕都得遭殃。事实上,从鲁迅的任何一篇文章和任何一次谈话中,都找不到他对革命领袖和革命运动所作的类似评价。像这样的过

度阐释,其实是对历史事实的颠倒和重写。不论这种阐释本身是否包含合理因素,但只宜作为阐释者个人的意见发表,而不应附会强加于鲁迅。

比“过度阐释”危害性更大的是在学术外衣下的“政治误导”。“学术归学术,政治归政治”,这是当前不少学者的善良愿望和执着追求。我们经历过那种学术沦为政治附庸的畸形岁月,对此心有余悸,身有余痛。然而,作为文明批评和社会批评武器的鲁迅著作,本身就包含着极其丰富的政治因素,因此在阐释鲁迅作品时要想完全回避政治是几乎不可能的。近些年来,“鲁迅与胡适”是思想文化界的一个热门话题,还出版了若干同名的专著和资料集。鲁迅与胡适都是五四时期开一代新风的启蒙者,对他们进行深入的比较研究完全允许,十分必要;对于双方成就和局限的评估也可以见仁见智。问题在于,当前有人肯定胡适、否定鲁迅的理由,是因为胡适能以英美宪政作为政治榜样,以自由主义的政治体制作为终生追求。他们断言:胡适的这种“路径依赖”仍然应该成为我们今天的“路径依赖”。显然,这种看法是一种不符合中国国情的政治误导。当今世界呈现的是一种政治多极化的格局,不同国家有着各不相同的基本政治体制。例如英国和日本实行的是议会制的君主立宪制。欧美不少国家实行的是代议民主共和制。但总的来说,这些体制都是以个人权力为基础,以多党或多利益集团竞争为特征,以国家三权分立为制衡机制。社会主义国家的代议民主共和制也有多种具体表现形式——我国的基本政治体制就跟俄罗斯、朝鲜、古巴、越南各有不同。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多党

合作和政治协商制度。这是历史的选择,人民的选择。在人类社会日益走向民主化和法治化的进程中,我国无疑应吸收人类文明的一切进步思想成果——包括西方政治文明的合理成分,进一步发挥民主、法治、宪法、制度的功能,其目的是提高中国共产党科学执政、民主执政、依法执政的能力,不断巩固和发展我国的基本政治制度,而不是另起炉灶,照胡适的主张全盘移植西方的政治制度。

总之,鲁迅遗留给我们的文学经典是特定历史情境的产物,对它的解读和阐释也必将是一个不断深化的历史过程。鲁迅作品是跟中国近代无数志士仁人的奋斗理想和战斗精神联系在一起的,不仅具有百科全书式的历史文献价值,而且蕴藏着丰富的具有现代意义的精神资源。在以追求商业性为时尚以至连脸蛋和三围也成为了文化生产力的当下,鲁迅作品高扬的旋律在读者心中就显得更为珍贵。我们珍视鲁迅文化经典,既是文化上的寻根认祖,也是对现实生活中某些缺失的针砭和疗治。我们应该共同努力,营造一种和谐的学术环境,使鲁迅研究沿着正确的方向深入开展,把鲁迅学的学科建设提高到一个新的水平。

(本文系根据作者 2004 年 8 月 16 日上午、8 月 19 日上午两次发言修订增补,发表时有删节)

参考文献:

- [1] 外国友人忆鲁迅 [Z]. 北京:北京图书馆出版社, 1998
- [2] 我国缘何缺乏科普创作大师 [N]. 北京:人民政协报, 2004-09-14

责任编辑 沈利华

Contemporary Explanation of Cultural Classics of Lu Hsun —— Speech on International Seminar of Study of Lu Hsun for 20 Years

CHEN Su-yu

(Lu Hsun Museum of Beijing Beijing 100034, China)

Abstract Lu Hsun's cultural classics include rich elements of modernity. Explanation of that is not only the seeking for root of culture but the criticism and treatment of some defects in real life. Study of Lu Hsun should be put in present world and respond to the ideological and cultural theme of modernization so as to combine its lasting cultural significance with the real social demands.

Key words Lu Hsun; Cultural Classics; Modernity